

批判

『文学台独』

(增订本)

下卷

主 编 赵遐秋
副主编 石一宁 谢 香

WENXUE TAIDU PIPAN

台海出版社

『文学台独』

批判

(增订本)

下卷

主 编 赵遐秋
副主编 石一宁 谢 香

WENXUE TAI DU PIPAN

台海出版社

辑四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文坛“台独”势力丧失民族气节，和日本学术界的右翼势力串通一气，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美化“皇民文学”的浊浪，企图由此而进一步美化日本当年的对台殖民统治，为殖民者招魂，并使“受惠”于这种殖民统治的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与祖国分离。

丧失民族气节 美化“皇民文学” 为殖民者招魂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

曾庆瑞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掀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举国上下,全民抗战,这使得台湾同胞坚持了40多年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走进了新的历史阶段。广大台湾同胞热望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早日到来,企盼着早日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走向了覆亡前的疯狂,企图实现“大东亚圣战”美梦的日本侵略者,分别在朝鲜和台湾加紧了殖民统治,疯狂地推行“皇民化运动”,以期建立“战时体制”。台湾,进入了日本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新文学刚刚赢得的发展新高潮,旋即遭到了极大的挫折。新文学运动进入了极为艰难的发展阶段。

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台湾光复,回归中国,8年间,台湾新文学走向何处去?历史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情景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妄图在法西斯高压下使台湾新文学蜕变为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的“皇民文学”;而挺直了民族脊梁的台湾爱国文学家,则守望在台湾新文学的精神家园,为反抗“皇民文学”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妥协、投降,摧毁台湾新文学的民族解放的精神,还是反抗、斗争,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引导台湾新文学走向新的胜利?两种对立的文艺思潮,两条对立的文艺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不幸的是,这一段历史,在台湾文坛,现在也被篡改了。人们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20年的时间里,文坛“台独”势力丧失民族气节,和日本学术界的右翼势力串通一气,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美化“皇民文学”的浊浪,企图由此而进一步美化日本当年的对台殖民统治,为殖民者招魂,并使“受惠”于这种殖民统治的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与祖国分离。

这真是文坛“台独”势力在痴人说梦。无情的历史,在纪念那些为反抗“皇民文学”而坚决斗争的先驱者的时候,也早就把“皇民文学”的炮制者、鼓

吹者和推行者钉死在耻辱柱上了。

为了更好地认清文坛“台独”势力美化“皇民文学”的反动本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

一、战时体制与“皇民化运动”给新文学带来浩劫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已经进一步法西斯化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将校率领1400余人的部队，举兵蹶起，杀死了内阁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首相冈田倒是得以幸免。哗变的部队占领了皇宫周边的永田町一带，要求改造国家，由军人执政。冈田内阁总辞职。第二天，东京戒严。29日，戒严部队开始讨伐，叛军投降。3月9日，广田弘毅内阁上台。7月5日，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对“二·二六”事件作出判决，17人被判死刑。7月12日，除矶部、中村外，其余15人被执行死刑。“二·二六”事件虽然被平息下去，但整个日本帝国的法西斯化进程加快了。比如，7月10日，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小林良正等讲座派学者，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都遭到了逮捕。同时，又加紧了和德国法西斯的勾结。这一年的11月15日，在柏林，日德两国就签订了共防协定。日本国内，几经动荡之后，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卫文磨内阁上台，终于完成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为了配合这一战争的发动，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加紧了殖民统治。比如，1936年6月3日，《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法》公布。6月17日，在台中公园的始政纪念日的庆祝会上殴辱爱国人士林献堂，制造了“祖国事件”。6月23日，日本政府为大力奖励来台移民，成立了秋津移民村。9月2日，日本海军大将小林跻造继中川健藏任台湾总督，20日，就实施了《米粮自治管理法》，进一步加强了控制。10月，清水人蔡淑悔以中国国民党身份在台组织众友会，提倡民族主义，也立即遭到镇压。到1937年4月1日，这种殖民地迫害更形疯狂，总督府命令禁止报刊使用中文。《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三报停止了中文版，《台湾新民报》中文版则缩减一半，并限定6月1日全部废止。“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台湾军司令部就发表强硬声明，对台湾民众发出警告，并召开临时部局首长会议，议决设立临时情报委员会，同时下令解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8月15日，台湾军司令部进入战时体制。9月，根据日本帝国近卫内阁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制定了台湾“皇民化”方针，强迫推行“皇民化运动”。10日，就设置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开始强召台湾青年充当大陆战地军伕。接着，9月18日公布《军需工业动员法》，11月1日公布《移出米管理案要纲》，11月2日公布《防空法台湾

施行令》。这以后,几年之内,日本帝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紧推进“皇民化运动”。比如,1938年1月23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发表关于台民志愿兵制度之实施,声称这一制度是为“皇民化”彻底之同一必要行动。31日,日本内阁议决台湾生产力扩充4年计划。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在台湾施行《中日事变特别税令》及其他有关法令,横征暴敛。2日,公布《台湾农业义勇队招募纲要》。5月5日,实施国家总动员令。28日,日本政府大肆移民来台。6月20日,台湾银行开始收购民间黄金。7月1日,统制石油类消费。9月17日,公布台湾重要物产调整委员会官制。1939年5月19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在赴东京途中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治台重点之“皇民化、工业化、南进三政策,及时开始”。他所说的“南进”,指的是日军南侵以台湾为基地。7月8日,公布《国民征用令》。10月,公布米配给统制规则。12月1日,牛岛中将任台湾军司令官。12月19日,台中州开始所谓“米谷贡献报国运动”,强行征用粮食支援日本帝国的侵略战争。1940年2月11日,公布台湾户口规则修改,规令台民改日本姓名办法。11月25日,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公布《台籍民改日姓促进要纲》。1941年2月11日,《台湾新民报》被迫改称《兴南新闻》。3月26日,公布修正台湾教育令,废止小学、公学校,一律改为国民学校。4月19日,日本当局成立“台湾皇民奉公会”,发行宣传杂志《新建设》,为适应战争需要,在台推行“皇民化运动”。12月1日,公布《国民劳动协力令施行规则》。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原住民被秘密编成“高砂义勇队”,派往南洋各地参战。30日,公布《台湾青年少年团设置纲要》。1942年4月,台湾特别志愿兵制度实施,强迫台籍青年参军到南洋战场。1943年1月5日,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6月21日,募得第二批陆军志愿兵共1030人。11月30日,日本政府强召台湾、朝鲜籍留日学生赴前线,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所谓壮行大会。12月1日,强行抽调学生兵入伍。1944年1月20日,公布《皇民炼成所规则》,加强“皇民化运动”。3月6日,公布《台湾决战非常措置实施纲要》。同月,台湾全岛6家日报,即台北《日日新报》、《兴南新闻》,台南《台湾日报》,高雄《高雄新报》,台中《台湾新闻》,花莲《东台湾新闻》,合并为《台湾新报》。8月20日,台湾全岛进入战场状态,开始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

这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皇民化运动”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殖民地台湾向着日本“本土化”,用日本国的“大和文化”全面、彻底地取代中国文化,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日本殖民当局把日语定为台湾岛上惟一合法的语言,取缔中文私塾,禁开汉语课程,报纸杂志禁用中文出版,甚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台湾同胞也必须讲日语,比如,“在火车上不讲日语

就不卖给火车票”。^① 强迫台湾同胞将中国人祖传的姓氏一律改换日本人的姓氏,更是阴狠毒辣。当时,对于坚持使用汉人姓氏的,日本殖民当局竟然不给登记户口,不给战时“配给品”,以至开除公职,投入监狱。在改换姓氏同时,日本殖民当局还强制推行了“寺庙神升天”的活动,取缔中国寺庙,捣毁神像,改换家祠中祖先神主和墓碑,强迫台胞奉祀“天照大神”,参拜神社。甚至于,连中国年节的习俗也予取缔,强令台胞按日本习俗过日本人的节日。日本殖民当局这样消灭中国文化,就是要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以确实达到‘内台一如’的境地。”^②那臭名昭著的“皇民奉公会”,强制推行“皇民奉公运动”,举凡“米粮自治管理”、“移出米管理”、“米谷供献报国”、“军需工业动员”、“收购民间黄金”、“统制石油类消费”、“国民征用”、“报国公债”、“国防献金”以及“贮蓄报国运动”和“农业义勇队招募”、“增产挺身青年运动”等等,又都使得对于台湾人力、物力的榨取几乎达到了极限。这样“皇民炼成”和“皇民奉公”的结果,就是在“战时体制”下,强召台湾青年为日本侵略战争充当炮灰,也充当帮凶。从1937年到1945年,8年间,强召“大陆战地军伕”,强召“义勇队”,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及“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学生兵入伍”,还有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其结果是,据陈映真在1998年4月2日~4日台北《联合报》副刊上发表《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披露,总共有27万余名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伕”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战争。战死、病歿、失踪者计5.5万余人,伤残二千余人,其中,因受“皇民化”愚弄摧残,中毒过深者,在南洋、华南战场中误信自己是真皇军而犯下严重屠杀、虐杀罪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者26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147人!

就在“皇民化运动”疯狂推行之时,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新文学也进行了疯狂的摧残。

前已说明,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禁用中文,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浩劫来临的一个标志。其直接后果,是杨逵主编的中日文并刊的《台湾新文学》接到台湾总督府命令,禁止刊登中文作品,6月,刊行到14期后,宣布停刊。

除了这一年创刊的《风月报》杂志还有中、日并刊到光复才停刊,其他的中文杂志,及至所有的文学杂志,一时间都不见踪影了。

1939年,长期在台的一些日本作家,以西川满为首,集合了滨田隼雄、北原政吉、池田敏雄、中山侑等人筹备成立“台湾诗人协会”。成员中,还包括

^{①②}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

有台湾作家杨云萍、黄得时、龙瑛宗等人。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西川满的右翼的、反动的“皇民主义”思想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了。日本学者近藤正己的《西川满札记》就指出:“若要想从他的作品中,找出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考虑、解释等描写则极为困难。”而他的作品,即使以台湾历史为题材写的片段,我们也可以明白无误地读到他的真实右翼思想。比如,在《赤崁记》里,西川满就写道:“在以高度国防建设为国家急务之今日,并非回顾个人自由平等的时候。个人无论如何要坚固职守,继承祖父之遗业,以为社稷。”在《云林记》里,西川满又写道:“如果我这一辈无法奉公,那个孩子、或孙子,过了两代、三代,只要是流着我的血,便使之尽皇民之赤诚,为乡土尽力吧!”^①1939年筹组“台湾诗人协会”时的西川满,已经自居于协力日本侵略战争的文化榜首,决心要充任日本“皇民文学”——文学侵略军的司令官了。

9月9日,“台湾诗人协会”正式成立。12月,协会的机关刊物《美丽岛》出刊,西川满、北原政吉任主编。《美丽岛》一共收有63人的作品。卷头言由日本右翼作家火野葦平执笔撰写。《美丽岛》只发行了一期。

同年12月4日,西川满拉着黄得时一起作筹备委员,筹备改组“台湾诗人协会”为“台湾文艺家协会”。1940年1月,改组完成,并于1月1日创刊协会机关杂志《文艺台湾》。西川满把持这一阵地,自任了《文艺台湾》的主编兼发行人。“台湾文艺家协会”共有台、日作家会员62人。其中,包括台北帝大、台北高等学校教授、警务局长、情报课长等,殖民统治当局的官方色彩极浓。尤其是,这一年,日本国内成立了“大政翼赞会”之后,“台湾文艺家协会”又因总督府情报部部长、文教局长、文书课长等高官担任顾问,“透过文艺活动,协助文化新体制的建设”的面貌越来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1941年2月,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和响应“皇民化运动”,“台湾文艺家协会”改组。台北帝大教授矢野峰人出任会长,西川满任事务长。矢野峰人虽然是个象征派诗人,但是,和西川满一样,也带有浓厚的殖民者统治意识。他曾以《文艺报国的使命》为题演讲。这“文艺报国”的话题,后来,在1942年6月由情报局指导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章程里有明确的阐释:“本会目的在于……,确实并发扬皇国传统与理想的日本文学,协助宣扬皇道文化。”又在同年成立的“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那里有了回应。这个“报国会”就宣称:“不受外来文化的毒害,确实日本主义的世界观,阐明并完成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原理,积极挺身于皇国内外的思

^① 引自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文载《台湾风物》,1980年9月、12月之第33卷3、4期。

想战。”^①看来,“台湾文艺家协会”的这次改组,也是有它一定的政治背景的。

1941年3月,西川满另行组织“文艺台湾社”,《文艺台湾》改由“文艺台湾社”发行。《文艺台湾》以“台湾文艺家协会”机关刊物的名义刊行了6期。改组后,名义上是同仁杂志,其实是由西川满一个人控制的。

这一年5月,张文环与王井泉、陈逸松、黄得时、中山侑等人组成“启文社”。5月27日,创刊《台湾文学》,成员以台湾作家为主,除张文环外,还有吕赫若、吴新荣、吴天赏、王井泉、黄得时、杨逵、王碧蕉、林博秋、简国贤、吕泉生、张冬芳等。

也就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赖和遭到日本宪兵队和警务局的共同调查,被捕50多天。

1942年6月,“日本文学报国会”特派久米正雄、菊地宽、中野实、吉川英治、火野苇平等来台湾,在各主要城市巡回举行“战时文艺演讲会”。8月,台湾“皇民奉公会”设置文化部。“台湾文艺家协会”会长矢野峰人兼任文艺班班长,“台湾文艺家协会”和“皇民奉公会”公开合流。10月,日本帝国政府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妄图把亚洲文学界都拖进“大东亚共存共荣”的罪恶活动中去。返台后,12月间,由“皇民奉公会”作后援,“台湾文艺家协会”组织他们在台北、台中、台南各地巡回举行“大东亚文艺讲演会”,极力鼓吹“皇民文学”。

1943年2月,“皇民奉公会”举行第一届“台湾文学赏”颁奖。西川满的《赤崁记》、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张文环的《夜猿》得奖。2月17日,“日本文学报国会”事业部长户川英雄等来台。3月,成立“统制会社”,由《台湾日日新报》社长担任社长,把电影、戏剧也纳入战时体制。4月,在台湾总督府情报部及“皇民奉公会”各部指使下,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其《规程》声称:“支部为谋所属会员之亲睦,透过台湾文学奉公会,以实现本会……之目的,努力宣扬皇国文化。”与此同时,“台湾文艺家协会”宣布解散。另外,又成立了“皇民奉公会”管辖下的“台湾文学奉公会”。

11月13日,由“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协办,在台北公会堂召开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会议讨论的题目是“确立本岛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到会的台、日作家约60多人。会前,台湾总督府的出版控制机构曾给全台报刊杂志下达提出“申请废刊”的命令。这次会议上,为贯彻这一“申请废刊”的决定,以西川满为代表的“皇民文学”势力,借着决战态势的压力,向张文环的“启文社”的《台湾文学》开刀了。西川满三次发言,表达了

^① 朱庭光编著《法西斯体制研究》。

“文艺杂志进入战斗配置”的决心,表示愿意把《文艺台湾》奉献给当局,同时还逼迫张文环的《台湾文学》废刊。会上,引发了双方面对面的斗争。

1944年1月1日出刊的《文艺台湾》终刊号上,关于这次会议大致上有这样的记载:首先是西川满的发言。他表示对台湾作家只在表面上装出“总亲和”的态度十分不满。接着,他以献出他所主导的《文艺台湾》杂志给日本决战体制为手段,要求其他文艺杂志也一齐跟着进入“战斗配置”,逼使不积极配合决战态势的文学杂志废刊。这实际上是针对以台湾作家和非法西斯日本作家所组成的《台湾文学》的。西川满的提议,当场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黄得时反驳道:“没有必要进行对文学杂志的管制,就像广告一样,愈多愈有人看,杂志也一样愈多愈好。”

滨田隼雄警告黄得时说:“不要把对物质的经济管制和对文化的指导统制混为一谈。”

杨逵赞成黄得时的意见,说道:“抽象的“皇民文学”理论与杂志的统合管制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神川清恼羞成怒地批评杨逵的发言道:“观念与具体实践是不可分离的。”并提醒杨逵道:“假如在政策上两者分离的话,国家将会灭亡。”

黄得时再说:“我并不反对西川满将《文艺台湾》献出的话,这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是其他的杂志并没有跟着配合的义务。”

接着,西川满又提出了动议,要求日本军国殖民主义当局撤销文学结社,把作家全部纳入“台湾文学奉公会”,进行文学管制。西川满甚至还赞同在“台湾文学奉公会”下另设“思想参谋本部”,对台湾作家进行思想控制。

这次会议,在台湾总督府保安课长的讲话中结束。他说:“对决战态势无益的都不要;文学作品也一样,只有对决战态势有益的才可发表。”这等于宣布了——“皇民文学”取代了台湾文学,日本军国殖民体制完全支配了台湾文学界。

会后,日本殖民主义者还继续打压台湾作家。比如,神川清写了《刎颈断肠之言》一文,批判杨逵的发言。他认为,杨逵的发言是本次会议中最不幸的事,这也许是由于杨逵不努力而生的无知;但是,以这样的态度从事文学的人,居然仍然可以在台湾安居筑巢,真是太遗憾了!又比如,河野庆彦写了一篇“决战文学会议”的感言《朝向思想战的集合》,对于台湾作家的“阳奉阴违”的态度,进行了攻击。他写道:“从会场的空气中感觉到,(台湾

作家们)只是把头探出来,说些诸如“皇民文学”、战斗文学的漂亮话,但双脚依然原地不动。……使人嗅到台湾文学的‘体臭’,感觉到泥巴和口水到处乱喷……我非克服这些内含的矛盾不可。……台湾文学已到了非‘脱皮’不可的时刻了,不要写在表面上装出总亲和的样子,而是要真正成为一支受统御的思想部队。”^①

显然,这一次推进“皇民文学”的会议,就是要使台湾文学“脱皮”成受日本殖民主义当局统御的法西斯思想部队——“皇民文学”部队。

《台湾文学》是在1943年12月13日接到废刊的命令的。吕赫若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当局下达《台湾文学》废刊的命令,真叫人感慨无量……”

《文艺台湾》和《台湾文学》废刊以后,1944年5月,在“台湾文学奉公会”名义下创刊《台湾文学》,同时还刊行了《决战台湾小说集》乾、坤两卷。

1944年6月15日,盟军攻陷塞班岛。16日,由中国基地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第一次轰炸北九州,开始了对日本的总反攻。7月21日,美军登陆关岛。日本本土和台湾处于盟军飞机猛烈轰炸之下,台湾进入“要塞化”时期。日本在台军国殖民当局对台湾文学的指令也由“决战文学”进入了“敌前文学”。为了配合这一形势,《台湾文学》6月号刊出了“台湾文学界总崛起”的专题。

这中间,为了强制推行“皇民文学”,1943年还爆发了一场有关“狗屎现实主义”的论战。

从上述战时体制下台湾“皇民文学”发展的过程来看,“皇民文学”势力正是在日本军国殖民体制下由御用日本文人操纵的一股法西斯势力。以西川满为代表,它是通过打压台湾文学而树立起来的。它是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在台湾施行的战争总动员体制的一环,是法西斯的“思想部队”。

在“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上,“台湾文学奉公会”会长山本真平曾说:“后方战士的责任,是在扩大生产以及昂扬决战意识;亦即与武力战结为有机一体的生产战、思想战……在思想战方面,诸位文学家正是承担着增强国民战力的任务。”关于这“任务”,山本真平说:“文学家既蒙皇国庇佑而生活,当然应当与国家的意志结成一体……今天的文学不能像过去一样,只在反刍个人感情,而应该是呼应国家的至上命令的创作活动,当然,文学也一定要贯彻强韧有力、纯粹无杂的日本精神来创作“皇民文学”。以文学的力量,激励

^① 有关“决战文学会议”的记录资料,会后神川清、河野庆彦文章的资料,用的是曾健民的中译本。曾译引用在他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结算》一文中。文载《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8年冬季号。

本岛青年朝向士兵之道迈进,以文学为武器,激昂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①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皇民文学”的“思想部队”的性质和“思想战”的性格。

对于这种“以文学的力量,激励本岛青年朝向士兵之道迈进,以文学为武器,激昂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的“皇民文学”,西川满、滨田隼雄、神川清等日本殖民者在文学战线上的代表人物,还提出了他们的批评标准。曾健民在1998年回过头来清算“皇民文学”的时候,在他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一文里,摘取了西川满、滨田隼雄、神川清等人文章的一些言论,指出这些批评标准是:

文学批评的基准就在日本精神。

即使文章的技巧有多好,但是如果忘了忠于天皇之道,如果把作为文人的自觉摆在作为日本人的自觉之上的话,我认为他除了是国贼或不忠者之外,什么都不是。

在皇国体的自觉中发现文学的始源,要求贯彻皇国体思想,把作品中国体结合在一起。

在终极时的精神燃烧——天皇陛下万岁,是一个文学者的描写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决战下,我们思想决战阵营的战士们,务必要扑灭“非“皇民文学””,要扬弃“非决战文学”。

我要为皇民的文臣,文臣之道在用笔剑击倒敌人而后已。

在这样的说教中,“皇民文学”已经明确地被铸定为体现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工具了。

当然,“激励本岛青年朝向士兵之道迈进”,“激昂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也是“皇民文学”对作品题材、主题的一种具体的规范。当时,极少数的台湾作家,丧失了民族的气节,自甘堕落,也的确创作出了这一类的“皇民文学”作品,以效忠于日本殖民统治者,效忠于日本天皇。

二、爱国文学家批判殖民者的“狗屎现实主义”论

在日本殖民当局加紧推进“皇民文学”的时候,爱国的台湾文学家,尽量回避日本军国殖民体制的法西斯文艺政策,继续以台湾的现实主义的传统

^① 曾健民译文。出处同前。

的文学精神,描写台湾人民的生活,以表现台湾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台湾人民不甘于殖民统治的精神苦闷为主题,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抗拒“皇民文学”派的压力,努力不使台湾文学沦为皇民化、御用化。这种文学精神,这种创作方法,自然成了推进“皇民文学”的一大障碍。

于是,一方面,用召开“决战文学会议”的办法来迫使台湾爱国作家就范;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决定要对这种文学精神、创作方法进行围剿了。

一场关于“狗屎现实主义”^①的争论就此激烈展开。

挑起这场争论的,是滨田隼雄在1943年4月号的“台湾皇民奉公会”的机关杂志《台湾时报》上发表的《非文学的感想》一文。滨田隼雄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个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大东亚圣战”时期转向,成了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的御用文人。在这篇文章里,他指责台湾文学有两大弊病:其一,是“有太多的文学至上主义的、从而是属于艺术至上主义的,而且充其量只不过是外国的亚流的浪漫主义”;其二,是“无法从暴露趣味的深渊跳脱出来的自然主义的末流”。滨田隼雄在阐述所谓台湾文学的“自然主义的末流”时,指责大部分的“本岛人作家”只会描写“现实的否定面”。而滨田隼雄所说的“现实的否定面”,指的就是爱国的台湾文学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当时的日本军国殖民体制的“决战态势”的现实采取否定的、不关心的或是逃避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指责台湾作家对日本的决战体制只采取逃避、不关心或否定的创作态度,只顾描写日本决战现实的负面的台湾社会现实。

随后,西川满上场,在“台湾文学奉公会”成立的那天,5月1日出刊的《文艺台湾》上,发表了一篇《文艺时评》。

在这篇《文艺时评》里,西川满借着推崇日本小说家泉镜花来攻击、辱骂台湾文学的主流是“狗屎现实主义”。泉镜花的主要作品有《高野圣》、《歌行灯》、《妇系图》、《日本桥》等。泉镜花的作品世界与日本的前近代文化以及土俗社会有很深的关联,作品的特色是富有鲜艳的色彩和梦幻性。受年少丧母的影响,由恋母之情转移到文学上对女性情深的描写,一直都是他的作品的重要主题。西川满在这篇《文艺时评》里怎么吹捧泉镜花人们可以不管,但他用吹捧泉镜花来攻击和辱骂台湾文学却令人不能容忍。西川满攻

^① 有关这场争论的文章,都是曾健民中译过来的。曾译中文译本,发表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9年秋季号上。为这场争论,曾健民同时还发表有《评论〈狗屎现实主义〉争论》一文。本书书写,多有采用。曾健民文中,对“狗屎现实主义”译名,有如下的说明:“原文是‘糞リアリズム’;在日文中,‘糞’这字,如果当作形容词用,有轻蔑骂人之意,若当作名词用就与‘屎’、‘大便’同义,因此译成‘狗屎现实主义’比较接近原意。”

击“向来构成台湾文学主流的‘狗屎现实主义’，全都是明治以降传入日本的欧美文学的手法”。“这‘狗屎现实主义’，如果有一点肤浅的人道主义，那也还好，然而，它低俗不堪的问题，再加上毫无批判性的生活描写，可以说丝毫没有日本的传统。”西川满讥笑本岛人作家只关注“虐待继子”、“家庭葛藤”的问题，“只描写这些陋俗”，“说他们是‘饭桶’！‘粗糙’！那还算是客气的话；看看他们所写的‘文章’吧！简直比原始丛林还混乱”。辱骂之余，西川满图穷而匕首现，立即搬出台湾作家中极少数变节屈从“皇民文学”的人写出的“皇民文学”作品来打压台湾爱国文学家了。他写道，就在台湾主流文学家只描写“陋俗”的时候，“下一代的本岛青年早已在‘勤行报国’或‘志愿兵’方面表现出热烈的行动了”。以描写这种“热烈行动”的“皇民文学”作家为榜样，西川满质问台湾爱国文学家们说，不是也“应该去创作一些……具有日本传统精神的作品吗？”西川满对台湾爱国文学家发出的威胁和警告是：“在东亚战争中，不要成为投机文学，应该力图树立‘皇国文学’，如此而已。”

对于滨田隼雄的指责和西川满的辱骂，吕赫若在5月7日的日记上写道：

西川满在《文艺时评》中的低能表现，倏尔惹起各方的责难。总之，由于西川无法用文学的实力压倒别人，才会用那样的手段陷人于奸计，真是一个文学的谋策家。……另外，滨田也是一个恶劣的家伙。

5月10日，《兴南新闻》学艺栏上，刊登了署名“世外民”的《狗屎现实主义与假浪漫主义》一文，大力驳斥了西川满的《文艺时评》。据叶石涛1983年版《文学回忆录》里《日据时期文坛琐忆》一文说，当时，西川满告诉他，这位“世外民”，就是邱炳南，也是台南人，曾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大。这邱炳南，也就是邱永汉。“世外民”的文章首先表示了对西川满的愤慨：

读了5月号的《文艺台湾》上刊载的西川满的《文艺时评》，它胡说八道的内容真使我惊讶，与其说它率真直言，倒不如说全篇都是丑陋的谩骂；实在让人感受强烈。

针对西川满诬蔑台湾爱国作家“创作态度有低俗恶劣的深刻问题，只搞一些毫无批判的生活描写，一点也没有日本的传统精神”等等，“世外民”的文章写道：

我以第三者的立场通读了《台湾文学》、《文艺台湾》和《台湾公论》，却很难看出本岛人作家的作品在创作的态度上有比内地人作家的创作态度更无自觉之处。……实际上，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不容易判定对或不对的；比如，毫无根据地说西川氏的创作态度比张文环氏或吕赫若氏的创作态度还更有自觉，这样的说法是会笑死人的。

说到西川满提出的“创作态度”问题，即文学精神、文学创作方法的问题，“世外民”对西川满指责的“狗屎现实主义”和西川满自己崇尚的浪漫主义，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西川满自称是个“浪漫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对此，“世外民”说：“我承认西川氏的审美式的作品的底流是对纯粹的美的追求。”但是——

同时，我也不得不说不本岛人作家的现实主义也绝对不是可以任意冠之以“狗屎”之名的，因为它是从对自己的生活的反省以及对将来怀抱希望这一点出发的，这些作品描写了台湾人家族的葛藤，是因为这些现象都是处于过渡期的当今台湾社会的最根本问题。西川对于这样的台湾社会的实情怠于省察，只陷泥于酬应辞令的表象，专指责别人的不是，这种作为，除了暴露他的小人作风外，别无他。还有，就算是挑语病吧！西川氏指责本岛人作家没有一点日本传统精神，这不禁使人怀疑他到底懂不懂传统的真义；所谓的传统，只有在促进历史或现实的社会进步上起作用的东西才可说是传统；依此而论，现实主义作为现代社会最有力的批判武器，是一点也不容被忽视的。

令人钦佩的是，在如此义正词严地维护台湾爱国作家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的同时，“世外民”还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西川满的“假浪漫主义”。“世外民”写道：

真正的浪漫主义也应该是在现实主义的根抵贯流的东西，没有明确的理想的浪漫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感伤主义罢了，它无自觉的肤浅之处，只不过是单纯的幻想。

我认为，当今台湾的文学最应该努力的地方，还是在要产生有指导性的文学；本来，若能出现具有永恒生命的艺术作品，是最理

想不过的,但是以现今台湾的文学的一般水平来看,似乎还未达到这种境界。因此,或许台湾的文学仍处于“狗屎现实主义”的水平也说不定,以这层意义来说,出乎意料,西川氏的《时评》,似乎也说对了;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该只指现实主义的“狗屎现实主义”了,包括感伤主义也一样,甚至于只要自称为浪漫主义的,也还是无法免于被指责的“假浪漫主义”吧!的确十分遗憾,台湾的文学毕竟还只是处于这种水平而已。

“世外民”的反驳文章还就“日本文学传统”问题指出了西川满的“假浪漫主义”的根本弱点。西川满在《文艺时评》里提到了《源氏物语》,说什么“夸跃世界的《源氏物语》,绝对不是属于‘狗屎现实主义’之流的”。“世外民”就借着这《源氏物语》说话,指出,“《源氏物语》虽然是最优美的文学作品之一,但它毕竟只是表现‘万物的情韵’的文学;它所表现的是贵族们的嬉戏,全篇都在描写恋爱的饱足与本能的满足,这也正显示了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确有它特殊的表达方式。”然而,“世外民”指出,“为了使日本文学有更健全的发展,除了充分发挥《源氏物语》所固有的美学之外,也应该更进一步在文学上表现出正义的呐喊、建立明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等等。”

就是这“正义的呐喊”,就是这“明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使得“世外民”在文章中表现了当时台湾爱国文学家不屈从“皇民文学”的高贵的民族气节。西川满不是叫嚷着台湾岛上“下一代”的“青年”“早已在‘勤行报国’或‘志愿兵’方面表现出热烈的行动了吗?不是叫嚷着要台湾文学中的主流作家们不要“无视这种现实”而要“自觉”地描写这种“热烈的行动”,像那些“皇民文学”作家一样去写“皇民文学”作品吗?“世外民”回答说,台湾的爱国作家绝不写那种“虚假的东西”,“绝不降低格调”!“世外民”写道:

虚假的效用,虽然在法律上是得以容许之事,但是只要有关于文学,则可有虚假的东西都是不得存在的。作者的虚假即使在作品中暂时得以成立,可是对于挚爱真理、只看重文学的真实性价值的人来说,这种虚伪的作品是一文不值的。因此,任何一部古今不朽的大作,都是作者灵魂的真实吐露;例如福楼贝尔就曾断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中,也滔滔不绝地论说自己的历史观,没有一部大作不是这样的。荷风也说过:“自从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之事感到莫大的羞耻以来,就自期自己的艺术品位至少要维持在江户作家的水平以上,绝不降低格调。”

“世外民”在这里引出了日本作家永井荷风,认定永井荷风这番话主要是针对文学的真实性经常受到来自社会的制约和左右而发的苛责之言来说的。显然,“世外民”看重或者说推崇永井荷风,就是因为,永井荷风一生特立独行,绝不曲学阿世,而是坚持用自己的作品批判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永井荷风违逆时代风潮,夜夜出没银座浅草等欢乐街,以斜里陋巷的风情来讽刺军国主义,写下了代表作《濠东绮谭》。太平洋战争时期,因为违抗“国策文学”的作风,永井荷风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但是,这更鞭策了他,鼓舞他更加努力地从事创作。《断肠亭日记》是永井荷风留下来的有名的日记,日记中清楚地记录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和批判。“世外民”请出永井荷风来批驳西川满,寓意极深,无疑是在正告西川满之流,台湾爱国作家也会像永井荷风那样,“绝不降低格调”以趋时,以迎合并屈服于“皇民文学”。在当时的险恶环境里,能够这样勇敢地抗拒“皇民文学”,真是难能可贵。有感于此,我们再读“世外民”写下的一段话,就无异于是在聆听当年台湾文学家的庄重的宣言了:

文学家的使命是为真理而活;如果无法坚持为真理和正义而活,那么文学家情愿要选择与荷风相同的命运呢?还是自甘降低作品的格调呢?毕竟,文学家的生命还是在艺术作品本身;福楼贝尔因为发表了《包法利夫人》而被控以扰乱风俗的罪名,但这反而使他一跃成名;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却深恐甚至极端厌恶其他的不纯要素介入艺术,当自己的作品被评为现实主义作品时,他极为愤怒,甚至说:“如果有钱的话,一定把《包法利夫人》全部买回来烧掉!”

文学作品是在无言之中雄辩地表现作家的价值的……

“世外民”反驳西川满的文章发表后一个星期,在5月17日的《兴南新闻》的“学艺栏”里,发表了18岁的叶石涛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给世外民的公开书》,不顾一切地为西川满辩护,为“皇民意识”、“皇民文学”唱颂歌,进一步辱骂“狗屎现实主义”,并且指名道姓地威胁、恐吓抵制“皇民文学”的台湾爱国作家。

这个叶石涛何以区区18岁,身为中国人却站在日本殖民者一边为虎作伥?他怎么就中毒那么深?鉴于叶石涛的欺骗性,我们不得不说一下他写这封《公开书》的背景。

叶石涛是台南的客籍人。在1983年版的《文学回忆录》里他曾自豪地